

大江大河里并不多见。在这个区域内，自然和经济的过渡性特征较为明显：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农业区和牧业区在这里交错分布。年蒸发量是降雨量的10倍以上，是个典型的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的地区。这里的冲积平原平畴沃壤，土层深厚，耕作性能良好，适宜开渠引水，自流灌溉。

黄河源远流长、水量丰富给两岸带来灌溉之利，同时也带来了水患频发。河套地区的先民为了生存，在沿河引水、开发灌溉等农业设施的共同劳动中，自发地团结起来，形成以群体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在与黄河抗争又依存的实践中，摆脱了对环境的单纯依赖。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饶之地七百里，徙内郡人民皆往充实之”，在河套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汉代在这里设立五原郡、朔方郡，移民戍边，大兴垦殖，作为粮仓，说明河套地区在秦汉时期已经有非常发达的水利技术。唐贞观年间，在河套修建了大型渠道，有的渠道可灌600公顷以上。自清代以来，“开挖退水，通稍畅流”。清中叶后，开渠种植日盛，清末已建成八大干渠。新中国成立后，三盛公拦河枢纽工程的建成，彻底改变了河套地区近2000年来无坝引水，不能控制水位流量的历史。总排干工程，彻底结束了黄河灌区有灌无排的历史。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乌梁素海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功能性湿地、我国第八大淡水湖，是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是一个山水林田湖草沙兼具的复杂共生生态。作为全球荒漠与半荒漠地区少见的大型草原湖泊，乌梁素海流域生态修复治理工程成功地阻止了乌兰布和沙漠向东侵蚀，承担起了调节黄河水量、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区域气候等重要功能，是北方多个生态功能交汇区的天然屏障，也是控制京津风沙源的天然生态屏障。

一部河套史就是一部人、水之间调整、磨合关系的历史；是河套人民不断认识自然，掌握水的运动规律，与水共生，除水害兴水利的历史；也是河套人民与水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发展史。数千年来，河套人民在灌区开发、巩固国家边疆安宁、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草原是我们的父亲，草原给了我们那么多的财富，那么多滋养，那么多美丽的歌谣，为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牛、羊、骆驼、那么多文明的蒙古包，敖包、勒勒车。草原生态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一部分，草原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基本文化框架都是由草原生态文化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乌拉特草原牧民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是草原牧民生态文化的共性。他们以敬畏